

## ■ 热点话题

## ■ 媒体评说

工人日报：  
一旦单双号限行也不行了怎么办

必须看到,限行只是治标不治本,以行政手段人为限制车辆上路,并不能削弱公众的出行需求。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于是人们只能见招拆招,设法让自己在限行的夹缝中“左右逢源”,比如设法买第二辆车?治理拥堵不能只做减法,而应多做加法,在限行的同时给公众出行诉求以其他的释放窗口。比如,加快拼车合法。拼车在发达国家很正常,既有利于有车族,又有利于国家节能环保。尾号限行不管用了就单双号限行,单双号限行也不管用了怎么办?让所有车辆按尾号每周仅出行一天?但愿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能拿出点“货真价实”的智慧来!

广州日报：  
遏制“带病提拔”必须举荐倒查

24岁深大研究生涂谦以72名落马官员为样本研究,认为腐败期间能晋升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官员“失察罪”在我国古代就有,举荐和考核官员出现失误,那是要受到严惩的,不仅贬职罢官,掉脑袋的也不乏其例。譬如,清代对同僚官员、上下级官员的连带责任作出了规定。被举官员一旦违法,保举、荐举官即要受到惩戒。另外,官员失察家人、胥吏等也将负连带责任而受到处罚。对于这一点,我们大有继承之必要。甚至可以说,“倒查制”就是“带病提拔”的克星。

北京晚报：  
城市拥堵费应从外来车辆收取

城市拥堵费就是个价格杠杆而已。想让城市有多少车辆,那就看你的收费价目表如何制定了。对于拦不住的事情,有时就只能帮助想一想尽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搞得更好一点。倘若城市拥堵费非收不可,我的下一个建议是从外地进城车辆收取。据几位出国的朋友告诉我,欧洲一些国家里的大城市,比如意大利罗马,对本地居民车辆不收费,外地车辆进城收费,这也是一种收取拥堵费的办法。各地城市可以根据自己城市的发展和需要,收取外地车辆进城费,价格高低也自行决定。

京华时报：  
对收入差距鸿沟不能再视而不见

因经济增长而扩大的“蛋糕”,并非等而食之才合理。对企业和社会贡献率的大小,以及不同行业和工种天然存在的差异,决定了工资收入的差异性,这其实是人力资源的合理价格配置。但是,当收入差距已然失衡到数十倍、千倍计时,这表明人力资源价格配置的失衡,表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均。更需要担心的是,收入差距鸿沟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行业以及个人竞争力强弱所决定的,而是资源占有寡在起作用。

合肥晚报：  
“中国式过马路”实质是缺失规则意识

马路上,红绿灯就是交通规则,按照红绿灯指示过马路,就是对规则的一种遵守。只有遵守这种交通规则,才能在保障他人利益的同时,也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有人不遵守这种交通规则,就会对交通秩序带来破坏,害人害己。法治社会同时也是一个规则社会,离不开社会成员对各种规则的尊重和遵守。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规则,才让每一位社会成员在自己的既定轨道内工作、学习和生活。而“中国式过马路”则更加倾向一种“集体无规则”,后果必然是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序。

## 莫做公民权的旁观者

□江德斌(浙江)

“微笑局长”杨达才已经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申请公开其工资的大学生刘艳峰的目标却仍然没有实现。刘艳峰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将会继续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将此事进行下去。他认为,现在敢做“出头鸟”的人太少了,放弃权利成了一种社会常态。习惯抱怨与谩骂的人多一个,用行动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就会少一个。(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刘艳峰敢于出头的勇气可嘉,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体现出自己的胆识和意志,依法行使了一位普通公民的监督权,并赢得公众的集体赞赏。而陕西省财政厅拒绝公开、陕西省安监局不予回复的态度,则凸显地方政府部门在面对公民申请时,未能遵守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并且缺乏应对舆论的经验,态度过于生硬冰冷,尚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同时,也表明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有时日,但仍然欠缺严格执行的力度,以及在细节上的界定不足。

刘艳峰将自己比喻为“出头鸟”,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出面质疑官员收入、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监督公车滥用情况、举报官员贪污腐败等行为,均被视为在向权力挑战,要冒着很大的风险,需要有承担未知后果的勇气。事实上,既有“出头鸟”成功出头的例子,但也有很多“出头鸟”遭受打击报复,甚至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惨剧。而也正因为如此,挑战权力的风险过大,使民众普遍心生畏惧,不敢做“出头鸟”,刘艳峰也就成为另类人物。

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来看,需要有更多的“出头鸟”,依法行使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挑战权力和“潜规则”,哪怕只是寸功,亦可以让公众

看到进步的希望。当然,社会亦需要创造相应的环境,给“出头鸟”一个宽松的舆论空间和出头机会,切勿轻言炒作、讽刺挖苦,如此,才能形成良性发展,以鼓励更多人敢做“出头鸟”。

“如果你觉得世界不公平,那么请用你的双手去改变,而不是用你的嘴巴去抱怨!”刘艳峰的座右铭简单直接,道破了社会所存在的弊病,面对社会问题时说得多做少、只说不做,甚至不做也不说等,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如今,“出头鸟”虽少,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正在引领更多人加入,共同参与公民监督、维护权利、扶助弱势群体等公共事件。

或许我们不是“出头鸟”,但不妨保持热切的关注,给他们一点掌声,在旁边高声鼓励。毕竟,社会进步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集聚起正能量,就能实现点滴的进步。

## ■ 今日关注

## 很冠冕但不堂皇的拒录理由

□邓荣河(山东)

去年9月,刘金星报考了福建省委办公厅一科员职位,在笔试、面试环节中分别取得第一名。正当辞掉工作的刘金星满怀欣喜准备入职时,却被电话告知因性格原因不予录用。昨天下午,福建省委办公厅、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对此作出解释,称在考察环节发现问题,该处理方式符合规定。(10月18日《京华时报》)



李宏宇图

读罢报道,第一感觉是福建有关部门的拒录理由,很冠冕,但一点也不堂皇。

首先拒录理由弹性太大。“因性格原因”不予录用,让人一头雾水。去年8月,福建省委办公厅向社会公开招聘技术中心科员1名,要求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一个小小的科员,到底需要怎样的“高性格”?令人费解。

其次,前后拒录理由有别,有欲盖弥彰之嫌。据报道称,最初的拒录理由是“作风问题”,后来改为“性格问题”。假如“作风”有问题,拒录有着很堂皇的理由。但后来有关部门改了,改成“性格问题”——很明显,人家的“作风”没问题。为何最初弄出人家的“作风”有问题?显而易见,有关部门的“作风”有点问题。

另外,有关负责人下出的“符合规定”的结论,有点早。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有关负责人有自认为说得过去的事实依据——那就是“由于岗位未进行递补,最终并未公示该岗位录取结果,亦符合相关规定”。其实“未进行递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刘金星确实不适合,但还没有合适人选;二是明明有合适人选,但绝不犯那小儿科的错误——不敢在风头浪尖上把“合适人选”扶正,待到风平浪静之后再“顺理成章”。当然,笔者希望是前者,因为公务员招考,本来是件很阳光的事,笔者不愿也不希望看到阳光下的龌龊。

## 读报短评快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 国企员工敬业度最低有点“意思”

日前,江苏省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南京市领航人才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敬业度最低。国企员工为何敬业度低?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昕认为,大部分国企的绩效受政府和政策影响较大,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市场化水平不足。比如,在员工招聘方面受人情关系影响较大,绩效考核流于形式,尤其是对于敬业度较差且绩效明显达不到要求的员工,也无法通过降薪降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加以处理。(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在哪一个岗位,员工敬业度主要取决于薪酬与进步成长机制。现阶段,国企薪酬具备较强竞争力,但员工内部激励竞争机制乌烟瘴气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从国企内部结构上看,养人不干事、人浮于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方面,国企留不住人才,另一方面,国企成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解决家属亲戚就业,乃至进

步升迁的后花园。在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面前,公平竞争要么根本异化为墙上制度的虚假把式,要么只是局限于无碍领导干部利益的小范围现象。

当成长进步让位于巴结权力,工作能力屈从于门路关系,当员工渴望的公平竞争进步机制成为易破的肥皂泡,国企的人事管理自然上气不接下气,别说激励员工爱岗敬业,就是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理顺便已属不易。当那些倚仗非正常通道上升者除了享受待遇外,既不可能充分履行岗位职责,还可能反向激励更多员工崇尚不信能力信关系的灰色哲学。

朱刃

## 花巨资引进院士不如直接投资科研

16日,辽宁省政府披露,如果某单位引进或培养出一名院士,辽宁省将对单位奖励1亿元。此前辽宁省引进一名院士的奖励是2000万元,1亿元的力度在全国也比较少见。

不过,奖励1亿元的前提是引进的院士必须真正在辽工作,是该省某家单位的职工,包括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都必须在辽宁,而非简单的挂职或聘用。(10月18日《京华时报》)

院士称号虽是中国科学家的至高荣誉,但只是个人荣誉,与地方无关。地方政府不该也不能介入院士评选,通过助选、拉票等方式干扰院士评审和选举。但1亿元的重奖必然导致相关单位不惜血本地争夺院士名额,等于变相鼓励他们花钱拉票搞贿选或是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干预院士选举,助长舞弊行为,败坏选举风气。当中国的科学家都热衷于争夺院士称号与其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时,还有精力专注于科研吗?政府和有关单位拨付的科研经费也可能会有相当部分被用于拉关系或被直接侵吞。这种奖励越多,对正常的科研破坏也就越大。

各地频频爆出重奖引进院士的新闻,与其说是求贤若渴,不如说是把院士当成了花瓶,以此来装点政绩。如果真正重视科研,重视科技人才,就别把院士数量当回事,而应把有限的科技经费用于培养科研后备人才和投资科研项目,取得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更有意义。杨国栋